

凉州石窟遗迹和“凉州模式”

宿 白

(北京大学考古系)

佛教艺术从新疆向东传播,首及河西地区。河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魏晋以来在武威,即凉州。西晋译经大师竺法护往来河西、长安、洛阳间¹⁾,东晋中原地区的名僧道安(314—385年)谓其译经“寝逸凉土”²⁾。“凉州自张轨以来,世信佛教”³⁾。四世纪中期,邺都有凉州博学沙门⁴⁾。其时张氏在凉州东苑置铜像⁵⁾。373年,前凉统治者张天锡延揽月支人、龟兹人组织凉州译场,并亲自参加译经工作⁶⁾。374年,道安在襄阳撰《综理众经目录》时,其《凉土异经录》中,已收凉州译经五十九部、七十九卷⁷⁾。376年,前秦陷凉州,所遣凉州刺史杨弘忠崇奉佛教⁸⁾。之后,武威太守赵正亦崇仰大法,忘身为道⁹⁾。379年至385年,道安在长安译经,译场的主力竺佛念是凉州沙门,佛念洞晓梵语,“苻姚二代为译人之宗”¹⁰⁾。这时,凉州僧人多西行求法,明确见于记载的有:竺道曼之去龟兹¹¹⁾;智严随法显西行,后又泛海重到天竺¹²⁾;又有宝云

1) 参看《出三藏记集》(以下简作《祐录》)卷十三《竺法护传》;《高僧传》卷一《竺昙摩罗刹传》;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以下简作《佛教史》)第七章《两晋之名僧与名士》。

2) 见《祐录》卷七释道安《合放光光赞略解序》。

3) 见《魏书·释老志》。

4) 参看《祐录》卷九《渐备经十住胡名并书叙》。

5) 《太平御览》卷一二四引《十六国春秋·前凉录》:张天锡“三年(365年),姑臧北山杨树生松叶,西苑牝鹿生角,东苑铜佛生毛”。

6) 参看《祐录》卷七《首楞严后记》、《开元释教录》卷四《总括群经录·前凉录》。

7) 参看《祐录》卷三《新集安公凉土异经录》和《佛教史》第八章《释道安》。

8) 《高僧传》卷五《释道安传》:道安“既达襄阳,复宣佛法,……四方学士竞往师之。时征西将军桓朗子镇江陵,要安暂住。朱序西镇,复请还襄阳,安以白马寺狭,乃更立寺,名檀溪,即清河张殷宅也,大富贵者并加赞助,……凉州刺史杨弘忠送铜万斤,拟为承露盘。安曰,露盘已托汰公营造,欲遍此铜铸像,事可然乎。忠欣而敬诺”。按朱序西镇之年为377年,其前一年,前秦下凉州,379年道安离檀溪西入关,因知弘忠刺凉,即在376年以后不久。

9) 参看《高僧传》卷一《昙摩难提传附赵正传》。正字文业,《祐录》卷九道安《增一阿含序》:“外国沙门昙摩难提……以秦建元二十年(384年)来诣长安……武威太守赵文业求令出焉,佛念译传。”同书卷十三《昙摩难提传》作赵政。

10) 见《祐录》卷十五《佛念法师传》。

11) 《祐录》卷十一《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卷后又记云,秦建元十五年(379年)十一月五日,岁在鹤尾,比丘僧纯、昙充从丘慈高德沙门佛图舌弥许,得此授大比丘尼戒仪及二岁戒仪……凉州道人竺道曼于丘慈因此异事,来与敦煌道人……。”

12) 参看《高僧传》卷三《释智严传》。

曾抵弗楼沙国,东归后南渡江,“江左练梵莫逾于云”,晋宋之际翻传诸经多云所刊定¹⁾。四世纪末,龟兹高僧鸠摩罗什居凉州十七年(385—401)²⁾,长安僧肇远来受业³⁾。其后,罽宾高僧佛陀耶舍亦来姑臧,后秦末,耶舍还国犹托贾客寄经与凉州诸僧⁴⁾。凉州佛教渊源久远,412年,沮渠蒙逊入据之前,已大有根基了。

“沮渠蒙逊在凉州亦好佛法”⁵⁾。刘宋何尚之《答宋文帝赞扬佛教事》记蒙逊“末节感悟,遂成善人”⁶⁾。《高僧传》卷二《昙无讖传》亦记“沮渠蒙逊素奉大法,志在弘道。”蒙逊子牧犍(亦作茂虔)亦重佛教⁷⁾。故《魏书·高崇传附子谦之传》谓“凉国盛事佛道”,高谦之撰《凉书》记沮渠“国寺极壮,穷海陆之财,造者弗吝金碧,殫生民之力。”⁸⁾沮渠时期西去求法的北凉僧人,见于著录的多达十余人,其中有蒙逊从弟沮渠京声⁹⁾。在北凉译经的僧人,见于著录的亦多达十余人,有名的中天竺沙门昙无讖于421年到达姑臧,主持译场,道俗数百人,参与讨论¹⁰⁾,沮渠时期的凉州,遂成为当时中国的译经中心之一。因此,沮渠藏经亦为时人所敬重,南齐竟陵文宣王肖子良撰《净住子净行法门》,其第二十六章《敬重正法门》所举敬礼对象中列有“沮渠国大乘十二部法藏”¹¹⁾。重禅定,多禅僧,是北凉佛教的另一特点¹²⁾,此后,南北习禅者多受北凉影响¹³⁾。习禅多觅僻静之地,水边崖际开凿窟室更是禅行观影之佳处¹⁴⁾,所以,佛教石窟之兴多与禅僧有

1) 见《祐录》卷十五《宝云法师传》。

2) 参看《高僧传》卷二《鸠摩罗什传》。

3) 《高僧传》卷六《僧肇传》：“后罗什至姑臧，肇自远从之，什嗟无极。及什适长安，肇亦随人。”

4) 参看《祐录》卷十四《佛陀耶舍传》。

5) 见《魏书·释老志》。

6) 见《弘明集》卷十一。

7) 《太平御览》卷一二四引《十六国春秋·北凉录》记“沮渠茂虔为酒泉太守，起浮图于中街，有石像在焉。”蒙逊卒，茂虔嗣位后，凉州闲豫宫中译事犹盛，事见《高僧传》卷三《浮陀跋摩传》：“浮陀跋摩，此云觉铠，西域人也……宋元嘉之中达于西凉。先有沙门道泰志用强裸，少游葱右，遍历诸国，得《毗婆沙》梵本十有万偈，还至姑臧，侧席虚襟，企待明匠，闻跋摩游心此论，请为翻译。时蒙逊已死，子牧犍袭位，以犍承和五年岁次丁丑四月八日，即宋元嘉十四年（437年），于凉州城内闲豫宫中，请跋摩译焉，泰即笔受，沙门慧嵩、道朗与义学僧三百余人考正文义，再周方讫，凡一百卷。沙门道挺为之作序。”

8) 见《广弘明集》卷七《列代王臣滞惑解》。

9) 见于著录的北凉西去求法僧人有：沮渠京声，见《祐录》卷十四《沮渠安阳侯传》；道普，见《高僧传》卷二《昙无讖传》；道泰，见《祐录》卷二《新集经论录》和《高僧传》卷三《浮陀跋摩传》；僧表、法盛，见《名僧传》卷二六《据日释宗性《名僧传抄》，下同》；惠概（觉），见《名僧传》卷二十；法惠，见《名僧传》卷二五；昙学（静泰《众经目录》卷一、《大唐内典录》卷三皆作昙觉）、威德等八人，见《祐录》卷八《贤愚经记》。

10) 见于著录的北凉译僧有：昙无讖，见《祐录》卷十四《昙无讖传》；浮陀跋摩、道泰，见《高僧传》卷三《浮陀跋摩传》；僧伽陁，见《历代三宝记》卷九；道龚、法众、昙学、威德见《祐录》卷二《新集经论录》；智猛、昙纂，见《祐录》卷十四《智猛法师传》；法盛，见《开元释教录》卷四；慧嵩，见《静泰《众经目录》卷一；沮渠京声，见《祐录》卷十四《沮渠安阳侯传》。此外，《祐录》卷二《新集经论录》另记有出于凉州敦煌的《决定毗尼经》，未审译经人名。又《开元释教录》卷四《总括群经录·北凉录》录北凉新旧诸失译经有五十三部合七十五卷之多。

11) 见《广弘明集》卷二七。

12)、13) 参看《佛教史》第十九章《北方之禅法净土成佛律》。

14) 参看佛陀跋陀罗译《佛说观佛三昧海经》卷三、卷七和沮渠京声译《治禅病秘要法》卷上。僧人习禅之窟或名定窟，定窟一辞最早见于昙无讖译《大般涅槃经》卷三十。

关”。北凉既弘佛法,又聚禅僧,文献记载新疆以东最早的较具规模的开窟造像,始于沮渠蒙逊在凉州南山开凿的凉州石窟,并非偶然之事。关于凉州窟像事迹,见录于七世纪道宣(596—667年)撰《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中²⁾:

凉州石窟瑞像者,昔沮渠蒙逊以晋安帝隆安元年(397年)据有凉土二十余载,陇西五凉,斯最久盛。专崇福业,以国城寺塔修非云固,古来帝宫终逢煨烬,若依立之,效尤斯及。又用金宝终被毁盗。乃顾眄山宇可以终天,于州南百里,连崖绵亘,东西不测,就而斲窟,安设尊仪,或石或塑,千变万化。有礼敬者惊眩心目。中土有圣僧可如人等,常自经行,初无宁舍,遥见便行,近辄便止,视其颜面如行之状。或有罗土盆地,观其行不,人才远之,便即踏地,足迹纳纳,来往不住。如此现相,经今百余年,彼人说之如此。

蒙逊所斲窟,可能是以佛像为主的佛殿窟。六世纪慧皎《高僧传》卷二《昙无讖传》记蒙逊为母造丈六石像云:

伪承玄二年(429年),蒙逊济河,伐乞伏暮末于枹罕,以世子兴国为前驱,为末军所败,兴国擒焉。后乞伏失守,暮末与兴国俱获于赫连勃勃,后为吐谷浑所破,兴国遂为乱兵所杀。逊大怒,谓事佛无应³⁾,即欲遣斥沙门,五十已下皆令罢道。蒙逊为母造丈六石像,像遂泣涕流泪,(昙无)讖又格言致谏,逊乃改正而悔焉。

此事与道宣同时的道世在《法苑珠林·敬佛篇·观佛部感应缘》中,另有较详记录:

北凉河西王沮渠蒙逊为母造丈六石像于山寺,素所敬重。以宋元嘉六年(429年)遣世子兴国攻枹罕大败,兴国遂死于佛氏。逊恚恨,以事佛无灵,下令毁塔寺,斥逐道人。逊后行至阳述山,诸僧候于路侧。望见发怒,立斫数人。尔时,将士入寺礼拜,此像涕泪横流,惊还说之。逊闻往视,至寺门,举体战悸,如有犯持之者,因唤左右扶翼而进,见像泪下若泉,即稽首礼谢,深自尤责,登设大会,信更精到,招集诸僧还复本业焉。

慧皎、道世所记的“丈六石像”,大约即是道宣所记斲窟安设的“凉州石窟佛像”。按蒙逊自张掖迁姑臧,《资治通鉴》系于东晋安帝义熙八年冬十月。义熙八年即412年。兴国大败于枹罕的宋元嘉六年即429年。因此,可推测蒙逊开窟造像在412年至429年之间。蒙逊窟像的所在,从道宣记录知“于州南百里”。可是七世纪以后,此处窟像即不再见于著录。直到本世纪四十年代初,向达等先生才怀疑是武威东南九十多里的张义堡天梯山大佛寺⁴⁾。1952年,甘肃冯国瑞等先生曾去调查。1954年,史岩先生又去勘查,确定了那里即是沮渠蒙逊开凿的凉州石窟的地点,但蒙逊所斲窟已不存在,可能毁于大地震(据云隋以来陇西一带平均每六十年有一次大地

1) 参看刘慧达《北魏石窟与禅》,《考古学报》1978年3期。

2) 此事又见道宣《广弘明集》卷十五《列塔像神瑞迹》。

3) 兴国重佛事,见《祐录》卷九《优婆塞戒经记》:“太岁在丙寅(426)夏四月二十三日,河西王世子抚军将军录尚书事大沮渠兴国与诸优婆塞等五百余人共于都城之内,请天竺法师昙摩讖译此在家菩萨戒,至秋七月二十三日都讫。秦沙门道养笔受。愿此功德令国祚无穷,将来之世值迁弥勒,初闻悟解,速无生忍,十方有识,咸同斯誓。”

4) 参看向达《西征小记》,刊《国学季刊》七卷一期(1950年)。后收入《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论文集,三联,1957。

震)。天梯山现存石窟十三座,其中编号第 1 窟和第 4 窟是北朝式的塔庙窟¹⁾。五十年代末,天梯兴建水库,甘肃省文管会对现存的石窟中几座重要洞窟进行拆迁保护。在拆迁过程中,发现上述两座塔庙窟最下层壁画比敦煌莫高窟现存早期洞窟的壁画为早,因此怀疑它是北凉的遗迹。这个怀疑是有道理的,这两座洞窟应予以特别重视。



图一 武威天梯山石窟第一窟
1. 第一窟平面、立面示意 2. 最下层边饰

两窟没有发表实测图,现依据史岩先生的记录试作第 1 窟的示意图(图一, 1)。第 1 窟宽 4.78、高 5.15 米。中央有方形塔柱,塔柱基每面宽 2.27 米。塔凿三层,每层各面各开一大龕,龕内各置后代补塑的坐佛一尊。塔柱前面和窟左右壁前端已崩毁,左壁残长 4.48 米,右壁残更甚,其全部长度已无法估计。该窟是否尚有前室亦不便推测。塔柱和窟右壁上方残存部分壁画。第 4 窟除塔柱凿出二层塔和壁画残存更少外,形制、布局均略同第 1 窟。此两窟的开凿时间,似应在蒙逊所创窟之后。第 1 窟的最下层壁画,据敦煌文物研究所保存的几幅摹本观察,供养菩萨的自由姿态和发髻、服饰的形式,与酒泉、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北凉石塔基座所雕的供养菩萨有相似处。摹本中还有一幅两方连续的化生忍冬边饰,这是早期石窟文样的罕见实例(图一, 2)。

二

酒泉、敦煌、吐鲁番所出北凉石塔,现知有十座²⁾。其形制皆八角基座,圆形塔身;从其中保存较完整者可知塔身之上,尚雕有相轮和宝盖。细部情况记录如下:

酒泉高善穆石塔承玄元年(428 年)建。高 44.6、基座底径 15.2 厘米。八面基座每面雕供养人一身,左上端刻八卦符号。圆形塔身下部刻发愿文与《增一阿含·结禁品》,共三十六行。塔身上部(复钵)雕七龕佛像,一龕菩萨像。佛像皆着通肩服装,作禅定相,后有项光、身光。菩萨着有缙饰的宝冠,袒上身,有颈饰、臂钏,下着裙,交脚坐,后有项光和“靠背”。佛座为矮平莲座。圆拱龕,有龕柱,无龕楣。相

1) 参看史岩《凉州天梯山石窟的现存情况和保存问题》,《文物参考资料》1955 年 2 期。

2) 其中酒泉、敦煌所出八座,见录于王毅《北凉石塔》,刊《文物资料丛刊》(一),1977 年版。吐鲁番所出两座,本世纪初为德人勒柯克(Lecoq)劫去,宋庆石塔见“Chotscho”,图版 60,1913 年版。此塔与另一小石塔 1982 年曾运美国展览,见“Along the ancient silk routes”,图版 7、8,1982 年。

轮之上有宝盖，盖顶刻北斗七星（图二）。

酒泉田弘石塔 承玄二年（429年）建。残高41、基座底径21厘米。八面基座雕刻与高善穆石塔同。塔身下部所刻经文亦同，残存二十三行。塔身上部残存三龕，皆佛像，服饰、姿态和龕式俱同高善穆塔。无佛座。圆形塔身以上部分佚。

酒泉马德惠石塔 承阳二年（430年？）建。残高34、基座底径16厘米。八面基座雕供养人物，中有武士装者；八卦符号刻在每面上端；供养人物右侧各刻有易卦象榜题。塔身下部刻经文同上两塔，共三十三行。塔身上部雕七龕佛像。其中四龕着通肩服装，作禅定相；三龕服装左袒，作说法相。七像皆只具项光。一龕菩萨，着宝冠，袒上身，垂帔帛，有颈饰、臂钏和璎珞，下着裙，交脚坐，背后只具项光。佛为须弥座，菩萨坐藤座。尖拱龕，有龕柱、龕楣。自相轮以上佚。相轮下部的方柱上雕飞天八身。

敦煌南沙山石塔 修建年代不详。八面基座刻供养人物。中有武士装者。八卦符号刻在每面上端。塔身下部雕刻同以上诸塔。发愿文泐，行数不详。塔身上部仅残存龕中坐佛，服装姿态和龕式与马德惠塔同。无佛座。相轮三重以上佚。

酒泉白双县石塔 缘和三年（434年）建。残高46、基座底径21厘米。八面基座刻发愿文与《增一阿含·结禁品》，存十七行。塔身下部雕八龕，六龕禅定佛像，具项光、身光。一龕交脚菩萨，一龕思惟像，后两龕像后皆有“靠背”。塔身上部雕七龕禅定佛像，具项光、身光。一龕交脚菩萨，有项光和“靠背”。佛坐须弥座。火焰龕。圆形塔身以上佚。

酒泉程段儿石塔 太缘二年（436年）建。高42.8、基座底径12厘米。八面基座刻供养人物八身，无八卦符号。塔身下部刻发愿文和《增一阿含·结禁品》，共二十六行。塔身上部雕七龕佛像，只具身光，服装通肩与垂领相间排列，皆作禅定相。另一龕情况不详。佛坐矮平座。火焰龕，有龕柱。相轮之上的宝盖较宽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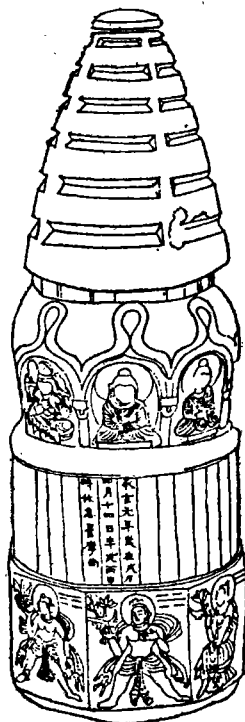
吐鲁番宋庆石塔 修建年代不详。高66厘米。八面基座刻供养人物八身，上端各刻八卦符号。塔身下部刻经文同程段儿塔，但经文标题作《佛说十二因缘经》，共三十五行。塔身上部雕刻和龕式同程段儿塔。佛坐莲座。圆式塔身以上佚。

吐鲁番小石塔 修建年代不详。高27.7厘米，基座底径不详。八面基座雕刻和塔身下部经文均同宋庆塔，但经文行数不详。塔身上部雕刻七龕佛像，形式同宋庆塔。另一龕交脚菩萨亦作禅定相。佛坐莲座。火焰龕，有龕柱。圆形塔身以上佚。

敦煌三危山石塔 修建年代不详。高40厘米。八面基座刻供养人物八身，右上端各刻八卦符号。塔身下部刻发愿文与《增一阿含·结禁品》，存十八行。塔身上部与吐鲁番小石塔同。佛坐须弥座。火焰龕。宝盖顶刻复莲。

敦煌岷州庙石塔 修建年代不详。残高46、基座底径48厘米。塔身下部刻模糊的立像一列，其上为《增一阿含·结禁品》，再上为婆罗谜字经文。塔身上部存五龕，四龕为禅定佛像，服装通肩与垂领相间排列。一龕为交脚菩萨，有“靠背”。各龕间各雕一供养人像，现存三身，有比丘和著交领大衣的男供养人像。佛坐须弥座。圆形塔身以上佚。

这批北凉石塔，最重要处是可增补天梯山1、4两窟已不存在的主要形象。石塔列龕中的



图二 酒泉高善穆石塔

主像是过去七佛坐像与弥勒菩萨交脚坐像,434 年石塔出现思维菩萨像。佛的姿态,428、429 年两石塔都作禅定相,430 年石塔出现说法相。佛的服装,通肩、右袒出现较早,436 年石塔出现双颌下垂内着僧祇支的服装。较早的佛座是矮平的莲座,434 年石塔出现须弥座。弥勒菩萨皆作着宝冠、袒上身的交脚坐式,430 年石塔弥勒菩萨已装饰瓔珞。428、429 年石塔无龕面装饰(龕楣)。430 年石塔出现了尖拱龕面,434 年石塔出现了火焰龕面。绝大部分石塔基座上的供养人物附刻有八卦符号;430 年石塔在供养人物右侧还刻出与易卦象结合起来的榜题,例如“三乾、父”、“三艮、仲男”之类。最早的一座(428 年)石塔,宝盖顶上还刻出北斗七星。这些东方传统的因素在北凉石塔上出现是值得注意的。它应与魏晋佛教形像杂有黄老道术的内容,有一定的联系¹⁾。

史岩先生在记录天梯山 1、4 两窟的中心塔柱时说它:“每层上宽下缩,此种样式和敦煌千佛洞略有不同,而在酒泉文殊山、民乐金塔寺则有同样的发现。酒泉文殊山、肃南金塔寺,还有张掖马蹄寺共有十多处塔庙窟。这批塔庙窟,保存较好的早期洞窟,可以肃南金塔寺东窟、西窟和文殊山前山千佛洞为例²⁾。

肃南金塔寺东窟 平面宽 9.7、高约 6 米。窟内正中凿方形的中心塔柱。现因前壁崩毁,塔柱已暴露在外。残深 7.65 米。原有无前室不详。中心塔柱每面宽约 4.5 米。基座之上,每面各三层,每层皆有龕像。下层每面各开一尖拱龕,龕楣尾塑反顾的龙头。龕内塑一右袒坐佛坐于矮莲座上。龕外两侧,除北面塑二比丘外,其余三面均为二菩萨。龕上部影塑大型飞天。中层每面开圆拱浅龕三,龕内塑一着通肩或右袒的坐佛,西面中龕坐佛为交脚式。龕间各塑一菩萨,唯北面龕间塑千佛。上层东、南、北三面各塑一坐佛,佛后塑半身菩萨,间罅处塑千佛或菩萨,或飞天。西面只左右侧存飞天一身。前壁与窟口已崩毁。左、右、后壁残存壁画有三层,里面两层内容不详,最外层画千佛。

肃南金塔寺西窟 平面略同东窟,但规模较小。中心塔柱基座以上,每面各三层,每层皆有龕像。下层除龕外无比丘、有武士外,大略同东窟。中层东、南两面正中塑通肩坐佛,西面正中塑思维菩萨。东、南、西三面两侧各塑菩萨坐像四身。北面正中塑右袒交脚坐佛,两侧上部各塑两菩萨,下部各塑两比丘坐像。上层每面塑千佛或菩萨。前壁与窟口已崩毁。左、右、后壁残存壁画有三层,最里层画千佛。窟顶绕中心塔柱画供养菩萨,外侧绘满飞天。

酒泉文殊山千佛洞 洞平面近方形,宽 3.94、深 3.8、高 3.6 米。窟内正中凿方形中心塔柱。有前室,宽略同于主室,深不详。中心塔柱每面宽 2 米。基座之上每面各两层,每层皆有龕像。下层每面各开尖拱龕一,龕内原塑坐佛一,龕外两侧各塑一菩萨。上层略同下层。前壁正中的窟口高 1.68、宽 0.53 米。西、北两壁尚存壁画。北壁分上下两部分,上部画着通肩服装的千佛,下部画通肩或右袒服装的立佛十身。西壁中部画阿弥陀佛及观世音、大势至两菩萨。阿弥陀两侧上部画千佛,下部画供养人行列。窟顶绕中心塔柱画飞天与伎乐天。

- 1) 《太平御览》卷一二四引《十六国春秋·北凉录》记沮渠茂虔任酒泉太守时在酒泉中街起浮图,其形制可据上述诸石塔推测。茂虔任职酒泉在 420 年至 433 年之间,其建浮图时正与石塔年代相若。北凉诸石塔以高窄的基座和粗壮的相轮为其特征。此种塔式与英人斯坦因(A. Stein)从若羌、焉耆劫去的小木塔极为近似(前者参看“Serindia”, IV, 图版 32; 后者见同书,卷,图版 128),因知是当时新疆中部以东以南流行的塔式。敦煌、酒泉靠近该区,再东即未见实例。
- 2) 参看甘肃省文物工作队《马蹄寺、文殊山、昌马诸石窟调查简报》(董玉祥、岳邦湖执笔),《文物》1965 年 3 期。史岩:《酒泉文殊山的石窟寺院遗迹》,《文物参考资料》1956 年 7 期。

上述所列三窟皆无纪年题记。肃南金塔寺东西两窟,据董玉祥、岳邦湖等同志描述其窟顶壁画和窟内塑像云:“菩萨与飞天均高鼻深目,体高肩宽,其画法是以朱色线条准确而又简练地勾出人物形体,衣饰部分施以石绿、浅黄或纯白等色,与敦煌早期壁画毫无共同之处。不仅壁画如此,其两窟内塑像,无论在人物形体或塑作手法上,也自成一格。在衣纹雕作上,多采用凹凸线条或圆线条,更增加了一种立体感和衣服的质感。另外,两窟造像大量采用高塑的方法,使一些造像贴壁而坐或凌云飞翔”。“金塔寺东、西两窟内所造菩萨与飞天的装饰,就各有六七种之多,如东窟中心柱中层东、西、南三面各龕外之菩萨服饰,就很少有两个是相同的。这些新的形式出现,将为研究我国早期石窟艺术造像方面,提供了新的资料。”由此知与敦煌莫高窟现存早期洞窟的绘塑不同。他们描述酒泉文殊山前山千佛洞的壁画云:“佛与菩萨其面像都体格魁梧,具有早期作品的特征。布局概括简练。用色以土红、赭石、石绿、纯白、蓝、黑等几种颜料为主。其画法的特点,先以土红或白色刷出人物基本形象,再用较深的宽线在颜面和肢体边缘勾出轮廓,然后以红线或黑线勾勒,使其定形之后,用鲜艳而又浓厚的色彩,涂其衣褶和帔巾等饰物,裙纹除用黑线勾画外,又在其边缘用一种比底色较深的颜色,晕染一道,使其明暗分明,增加了强烈的体积感。与新疆克孜尔千佛洞以及敦煌 272、275、254、259 等早期洞窟内之壁画,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似乎也表示了文殊山前山千佛洞早于敦煌莫高窟现存早期洞窟的看法。此外,值得注意的还有千佛洞阿弥陀、观世音和大势至这组为敦煌莫高窟现存早期洞窟中所没有的题材;而这种题材,却以不同的译名——“无量寿佛”,出现在刘家峡市炳灵寺的西秦龕像中¹⁾。敦煌莫窟高现存早期洞窟的年代,我认为仍以维持北魏时期的旧说为稳妥²⁾。因此,早于敦煌莫高窟现存早期洞窟的这三座塔庙窟的开凿,有可能出自北凉时期;或是北凉亡后,这里沿袭了凉州佛教艺术的系统而开凿的。无论前者,抑是后者,这三座塔庙窟是考虑凉州式样的重要参考对象,应该是无可怀疑的。

综合武威天梯山 1、4 两窟、酒泉敦煌吐鲁番所出北凉石塔和肃南金塔寺、酒泉文殊山前山这三座石窟的资料,我们初步考虑在我国新疆以东现存最早的佛教石窟模式——凉州模式,其内容大体可包括为以下几项:

1. 有设置大像的佛殿窟,较多的是方形或长方形平面的塔庙窟。塔庙窟窟内的中心塔柱,每层上宽下窄,有的方形塔庙窟还设有前室,如酒泉文殊山前山千佛洞之例。

2. 主要佛像有释迦、交脚菩萨装的弥勒。其次有佛装弥勒、思惟菩萨和酒泉文殊山前山千佛洞出现的成组的十佛(十方佛)、阿弥陀三尊。以上诸像,除成组的十佛为立像外,皆是坐像。

3. 窟壁主要画千佛。酒泉文殊山前山千佛洞千佛中现说法图,左壁说法图的主像是阿弥陀三尊;壁下部出现了供养人行列。

1) 参看甘肃省博物馆、炳灵寺石窟保管所《炳灵寺石窟》,图版 24,1982 年版。

2) 参看拙著《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敦煌》,刊丝绸之路考察队《丝路访古》,1982 年。

4. 边饰花纹有两方连续式的化生忍冬。

5. 佛和菩萨的面相浑圆,眼多细长型,深目高鼻,身躯健壮。菩萨、飞天姿态多样,造型生动。飞天形体较大。

三

距离凉州较近的早期佛教遗迹,还有刘家峡市的炳灵寺石窟。炳灵寺第 169 窟第六龕发现西秦建弘元年(420 年)题记和“□国大禅师昙摩毗之像”的榜题¹⁾,知道这里最早龕像始于西秦。西秦 411 年迁都枹罕,即今临夏,炳灵寺位于枹罕之北约八十余里,其地古称唐述山,《水经注·河水》记其地云:

每时见神人往还矣,盖鸿衣羽裳之士,炼精饵食之夫耳,俗人不悟其仙者,乃谓之神鬼,彼羌目鬼曰唐述,复因名之为唐述山,指其密堂之居,谓之唐述窟。其怀道玄宗之士,皮冠净发之徒亦往托栖焉。

西秦禅师选此地造龕像,正是取其幽密,便于禅行。《高僧传》卷十一《玄高传》云:

(西秦乞伏)炽槃跨有陇西,西接凉土,有外国禅师昙无讖(或即上述之昙摩毗——引者)来入其国,领徒立众,训以禅道。

又记关中禅僧玄高也为乞伏炽槃所尊崇:

尊(玄高)为国师,河南(指西秦——引者)化毕,进游凉土,沮渠蒙逊深相敬事。

西秦高僧或从凉州来,或向凉州去,可见西秦佛教与凉州关系密切,而西秦于炳灵兴建龕像之时(420—431 年),也正与北凉沮渠蒙逊在凉州南山新窟安置佛像的时间(412—428 年)相近,因此,参考炳灵西秦龕像,推测凉州石窟或许没有大误。

炳灵寺西秦龕像主要有 1 窟通肩立佛一身和 169 窟中的若干龕像²⁾。两窟皆利用天然洞罅,并未斲崖开窟。现将上述两窟西秦和较西秦为晚的重要龕像,试分两期,简记其内容如下:

一期(属于 420 年或稍后)

窟龕号 169:6 平面横长方形龕。龕内塑右袒禅定坐佛和二菩萨,有榜题:“无量寿佛”、“□观世音菩萨”、“得大势志菩萨”。右壁上方画十方佛,其下画“弥勒菩萨”立像。弥勒之右画“释迦牟尼佛”立像,像下有供养人行列。释迦立像右上方为建弘元年(420 年)题记,共二十四行。题记下方列供养人两行,上行第一身榜题“□国大禅师昙摩毗之像”,其后供养人榜题中有“乞伏□罽集之像”。

窟龕号 1 贴崖罅处塑通肩立像一身。现存二菩萨为明代塑像。

窟龕号 169:7 贴崖窟塑二立佛,现存左侧通肩立佛一身。下方绘壁画八铺,自上:立佛二,通肩禅定坐佛及二菩萨,通肩禅定坐佛一,通肩说法坐佛及二菩萨,右袒说法“无量寿佛”坐像,“维摩诘之像”及“侍者之像”,通肩禅定坐佛一,以塔为背景的“释迦牟尼佛”、“多宝佛”相对倚坐像。左下方绘壁画多铺,其中有右袒说法坐佛、二菩萨及胡人供养像一铺,该铺左上端有后来补绘的交脚菩萨坐像。

窟龕号 169:9—11 贴崖塑三立佛,一右袒,二通肩。左下方绘壁画多铺,有右袒坐佛及菩萨、通肩

1) 参看《炳灵寺石窟》,图版 17、24。

2) 参看《炳灵寺石窟》图版 5—7、13—32。

禅定坐佛。

窟龕号 169:17 西壁贴崖原塑一佛、二菩萨,现存右侧菩萨。右下方有思惟菩萨像一身。

窟龕号 169:18 西壁贴崖塑右袒立佛一身。

二期(较一期为晚)

窟龕号 169:22 贴崖原塑右袒立佛及二菩萨,现右侧菩萨佚。

窟龕号 169:? 位第22龕上方,贴崖原塑通肩禅定坐佛七,现存五身。

窟龕号 169:3 平面横长方形龕。龕内塑通肩禅定坐佛一,右塑菩萨,左塑力士。坐佛上端有飞天壁画。

从上述可见西秦在炳灵尚无凿窟的作法,除贴崖塑绘,即作横长方形平面开口形式的浅龕。龕像布局皆以一铺为单位,各铺间没有联系,这显然比若干单位有系统的组合在一起的洞窟设计为原始。第一期各单位的主要佛像有释迦坐像、立像,二立佛,三立佛和无量寿佛,其次有十方佛、弥勒菩萨立像和思惟菩萨像,还有与较晚的其他地点形式不同的维摩诘卧床和侍者像及释迦多宝相对倚坐像等。第二期出现了七佛、交脚菩萨坐像和一菩萨一力士组成的胁侍像。后一种胁侍组合既见于肃南金塔寺东窟、西窟,又见于敦煌莫高窟现存早期洞窟之一的257窟。而这种胁侍组合在炳灵第二期最晚的一组龕像之中。看来,炳灵第一期龕像比肃南金塔寺、酒泉文殊山前山千佛洞为早,是无可置疑的。因此,我们考虑凉州样式似可分为两个阶段:早期可参考天梯山残存的遗迹,酒泉等地出土的北凉石塔和炳灵第一期龕像;晚期可参考肃南金塔寺、酒泉文殊山前山千佛洞和炳灵第二期龕像。炳灵第二期龕像中最晚的如169窟第三龕的时间,大约已到了凉州式样的尾声阶段。

四

凉州系统的窟龕造像,大多来源于今新疆地区。凉州节制西域由来已久,西晋末,中原战乱,四世纪中期,位于塔里木盆地北沿的龟兹和南沿的于田,这两个西域的重要佛教据点都“诣姑臧朝贡”¹⁾。384年,前秦吕光一度攻占龟兹后,经龟兹东来凉州和自凉州西趣龟兹的僧人,日益增多,东来凉州的有名高僧有鸠摩罗什²⁾、佛陀耶舍³⁾、昙无讖⁴⁾、昙摩蜜多⁵⁾;西趣龟兹的有僧纯、昙充⁶⁾、竺道曼⁷⁾。此时,凉州佛教也和于田关系密切。约在三、四世纪之际,已有凉州道人

1) 《晋书·张轨传附孙骏传》:“至骏境内渐平,又使其将杨宣率众越流沙伐龟兹、鄯善,于是西域并降。……焉耆、前部、于田王并遣使贡方物。”《通鉴》系此事于咸康元年(335年)末。同书《四夷·龟兹传》:“惠怀时,以中国乱,遣使贡方物于张重华”。

2) 参看《高僧传》卷三《释智严传》。

3) 参看《祐录》卷十四《佛陀耶舍传》。

4) 参看《祐录》卷十四《昙无讖传》。

5) 参看《高僧传》卷三《昙摩蜜多传》。

6)、7) 参看《祐录》卷十五《佛念法佛传》。

在于田城中写汉译的《时非时经》¹⁾。此后,县无讖到凉州后又亲自去于田求《涅槃中分》²⁾,沮渠蒙逊从弟安阳侯京声亦去于田取经³⁾。此外,凉州僧宝云⁴⁾、僧表⁵⁾、惠概⁶⁾西去于田,智猛、昙纂也西历龟兹、于田后,东返凉州⁷⁾。文献记录北凉僧人去于田者,尚有昙学、威德等八人⁸⁾。其时,龟兹盛小乘,于田习大乘;龟兹多凿石窟,于田盛建塔寺。这两个系统的佛教及其艺术,于新疆以东首先融汇于凉州地区。上述凉州式样的窟龕造像,正如实地反映了这个事实。沮渠蒙逊设置丈六大型佛像于石窟之中,炳灵贴塑大像于崖壁和天梯、肃南金塔寺、酒泉文殊山前山千佛洞等处的方形或长方形塔庙窟,应都与龟兹有关⁹⁾,北凉石塔和凉州系统各窟龕所雕塑的释迦、交脚弥勒、思惟菩萨等,也都见于龟兹石窟¹⁰⁾;文殊山前山千佛洞内壁面上上下分栏的布局和中部以下壁画绘供养人行列的作法,也是龟兹石窟所习见¹¹⁾;值得注意的是凉州模式中保存较为完整的一处壁面——肃南金塔寺东窟中心塔柱西面的布局:下层为坐佛龕,上为交脚弥勒这一组形像,与拜城克孜尔石窟第80窟中心塔柱正面的设计极为相似¹²⁾。文殊山前山千佛洞中心塔柱龕外与窟顶绘画或影塑大型飞天,前者多见于龟兹大像窟¹³⁾,后者在塑像大部被毁的龟兹石窟中,虽然没有可以对比的资料,但在龟兹西南境外今巴楚东北的脱库孜萨来依发现的佛寺遗址中,出土了内容丰富的影塑,其中即有姿态类似的大型飞天形像¹⁴⁾。炳灵寺和文殊山塑绘的立佛列像,既见于龟兹石窟¹⁵⁾,又发现于时间略晚的和田北拉克塔院遗址中¹⁶⁾。金塔寺、文殊山壁画满绘千佛。千佛在龟兹石窟流行较晚¹⁷⁾,但为于田寺院流行的形像¹⁸⁾。此外,文

- 1) 《开元释教录》卷二《总括群经录·西晋录》:“沙门若罗严外国人也,译《时非时经》一部。经后记云:“外国法师若罗严手执胡本,口自宣译。凉州道人于田城中写记。房等皆云法矩译者,误也。既莫知于帝代,且附西晋录中。”
- 2) 参看《祐录》卷十四《县无讖传》。
- 3) 参看《祐录》卷十四《沮渠安阳侯传》。
- 4) 参看《祐录》卷十五《宝云法师传》。
- 5) 参看《名僧传》卷二十六。
- 6) 参看《名僧传》卷二十。
- 7) 参看《祐录》卷十四《智猛法师传》。
- 8) 静泰见《众经目录》卷一。威德见《祐录》卷八《贤愚经记》。
- 9) 参看拙著《克孜尔石窟部分洞窟的类型与年代》,《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I,日文版,1983年。
- 10) 同上。
- 11) 如克孜尔石窟 189 窟主室左右壁,参看《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III,图版 64、75,日文版,1985年。
- 12) 参看《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II,图版 43,日文版,1984年。
- 13) 如克孜尔石窟 47、48 窟和新 1 窟窟顶壁画,参看《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I,图版 152,158—160。又同书 III,图版 171。
- 14) 此寺址,1906 年曾被法人伯希和(P. Pelliot)盗掘,所出大型飞天影塑见法人韩伯诗(L. Hambis)编辑的“*Toomchdur*” I 图版 68:170,74:180—181,1961年。
- 15) 参看《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I,日文版,1983年。
- 16) 此塔院址,1900 年英人斯坦因(A. Stein)、1928 年德人特灵克勒(E. Trinkler)等皆曾盗掘,所出列像参看斯坦因“*Ancient Khotan*”(以下简称“斯坦因书”)II,图版 13—15、17、18、40,1907年;德人格罗甫(G. Gropp)编辑的“*Archäologische Funde aus Khotan. Chinesisch-ostturkestan*”(以下简称“格罗甫书”)图 93、99、105,1974年。塔院的年代,斯坦因推定为六世纪,时间虽略晚,当源于该地区或其附近的早期形像。
- 17) 见上揭《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I。
- 18) 如 1900 年斯坦因在丹丹乌里克盗掘的寺址,参看斯坦因书 I,图 29、同书 II,图版 3。又如特灵克勒在达玛沟北拉克拉斯特盗掘的寺址,参看格罗甫书,图 76。

殊山所绘的阿弥陀和炳灵寺的无量寿、释迦多宝、维摩诘等形像，目前虽不闻于田有相同的遗迹，但都出自大乘佛典，且都可在于田找到有关情况。和田东北丹丹乌里克和阿克特勒克等寺院遗址多出莲花化生形像¹⁾。按莲花化生，出于众生随九品行业，经过化生于莲花之中，始可往生极乐世界的信奉²⁾，因知于田曾流行《无量寿经》或《阿弥陀经》。三世纪末，于田沙门祇多罗译《维摩诘经》³⁾；约为八世纪祥公所辑的《法华经传记》卷一引《西域志》记：“昔于田王宫有《法华》梵本六千五百偈”，又记于田“东南二千里有国名遮拘槃国⁴⁾……王宫亦有……《法华》、《大涅槃》等五部大经，并十大偈。……又东南二十余里，有山甚峻难，峰上有石窟，口狭(狭)内宽，其内……《法华》凡一十二部，皆十万偈。国法相传，防护守掌”⁵⁾。看来，凉州系统的石窟中的大乘形像，应与于田及其以东关系密切。凉州系统的大乘形像，以最东边的炳灵寺为最突出。这一点，我们考虑还可以和当时长安佛教联系起来。四世纪末五世纪初，即沮渠佛教兴隆之前，东方佛教盛行关中。402年，鸠摩罗什在长安译《无量寿经》、《贤劫经》；406年，又重译《法华》、《维摩》⁶⁾，后又注解《维摩》。罗什译经时，广集四方义学参与研讨者，多至三千人⁷⁾，其高弟道融⁸⁾、昙影⁹⁾、慧观¹⁰⁾各疏解《法华》，僧肇¹¹⁾、道融¹²⁾、道生¹³⁾各注释《维摩》，因此，当时长安对《法华》、《维摩》之研讨论述，影响广远。我们怀疑炳灵壁画中出现早期形式的释迦多宝和维摩形像，很可能和这样的历史背景有关。如果上述推测无大误差，那么，距长安较近的炳灵窟龕出现较多的大乘图像，除了西方于田及其以东的影响外，很可能比凉州系统的其他石窟更多的受到来自东方长安的影响。至于五世纪前期的长安佛教及其造像，既有向西影响凉州的迹象，又有南下影响南方的文献记录，此饶有兴趣的问题，已超出本文研讨凉州模式的范围，容将另文讨论。

- 1) 丹丹乌里克所出化生形象，参看斯坦因书 II，图版 56、83、87。阿克特勒克所出化生形象，参看格罗甫书，图 129。
- 2) 参看支娄迦谶译《无量清静平等觉经》卷三、康僧铠译《无量寿经》卷下、昙良耶舍译《观无量寿经》。
- 3) 《历代三宝记》卷七《东晋录》录西域沙门祇多蜜译经中有《维摩诘经》四卷。此祇多蜜即《祐录》卷七释道安《合放光赞略解序》所记泰康七年(286年)赍《放光经》来洛阳之于田沙门祇多罗。参看日人羽溪了谛《西域之佛教》第四章《于田国之佛教》(贺昌群译本，1956年)。
- 4) 遮拘槃又译作遮拘迦，羽溪《西域之佛教》谓即斫句迦。斫句迦，斯坦因考其位置当在今若羌一带，参看斯坦因书 I，89—92页。
- 5) 《法华经传记》引《西域志》所记遮拘槃王宫事，应是442年鄯善王西奔且末以前的情况。参看冯承钧《高车之西徙与车师鄯善国人之分散》，《辅仁学志》十一卷一、二合期(1942年)，该文后辑入《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1957年)。
- 6) 参看《历代三宝记》卷八《前后二秦苻姚世录》。
- 7) 参看《高僧传》卷二《鸠摩罗什传》。
- 8) 见《高僧传》卷六《道融传》。
- 9) 见《高僧传》卷六《昙影传》。
- 10) 见《高僧传》卷七《慧观传》。
- 11) 见《高僧传》卷六《释僧肇传》。
- 12) 参看《高僧传》卷六《道融传》。
- 13) 见《高僧传》卷七《竺道生传》。

THE LIANGZHOU CAVE TEMPLE AND THE “LIANGZHOU TYPE”

by

Su Bai

In Tiantishan Mountain southeast of Wuwei City, Gansu Province, a group of caves have been identified as the Buddhist temple built near the ancient City of Liangzhou during the period between the transmigration of Juqu 沮渠氏, the founder of the Northern Liang Dynasty, from Zhangye 张掖 to Guzang 姑臧 and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s forces taking Liangzhou (412—439 A. D.). These large-sized grottoes are the earliest cave temple east of Xinjiang Province. Of them caves Nos. 1 and 4 were well probably opened in the Northern Liang Dynasty. In addition, the Northern Liang caves discovered in Jiuguang, Dunhuang and Turfan, the Thousand-Buddha Cave at Qianshan in the Wenshushan Mountains in Jiuguang,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caves of the Jintasi Temple in southern Gansu, and some of the niche statues in Caves 1 and 169 of the Binglingsi Temple near Liujiaxia City are all important references for the typological study of the Liangzhou Cave Temple.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se remains leads the author to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 on the principal features of the Liangzhou Cave Temple.

1. There are caves housing colossal Buddha statues and most of them are stupa caves, square or rectangular in plan. Each storey of the central stupa-column is broader at the top and narrower at the bottom. In some of the square caves was built an antechamber. In contrast to this, in the Binglingsi Temple, there seems to have been no practice of building deep caves at that time, and the statues and paintings were made nearest to or directly on the rock face either in natural rock shelters or in shallowly cut rectangular niches with the opening in front of them. Each niche is an independent unit in arrangement of images and has no connections with the rest.

2. The main Buddha statues are as follows: Sakyamuni and Maitreya in a sitting position and Sakymauni in a standing position. There are also Thousand Buddhas and Amitabha. The statues of Buddhas and Bodhisattvas are made with round face, narrow eyes and robust torso. The images of Bodhisattvas and flying devatas are vivid. The latter are made in large size. They are in dresses with the lace formed by laterally repeating the honeysuckle and miniature motif. On the contrary, the main Buddha statues of the Binglingsi Temple are Vimalakirti, Sakyamuni and Prabhutaratna Buddha sitting side by side.

The Liangzhou Cave Temple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above-mentioned features, which the author denominates the Liangzhou Type.

The niche and cave statues of the Liangzhou system mostly have their origin in the regions of Kuche and Baicheng (ancient Kucina) and Hetian (ancient Khotana) in Xinjiang.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records, they must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the eastern style from Chang'an in the so-called Guanzhong region. This was especially the case in the Binglingsi Temple, which had a close relation to the Liangzhou Temple.